

主 编

李匡武

副主编

周云之

周文英

中国逻辑史

近

代

卷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国逻辑史

近代卷

主编 李匡武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625 插页2 字数189,000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15

ISBN 7-226-00300-7/B·20 定价: 4.00 元

朱志凱

刘培育

李匡武

陈孟麟

沈劍英

周云之

周文英

全书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森

孙中原

朱志凱

刘培育

李元庆

何应灿

李建钊

陈正英

陈孟麟

沈劍英

张清宇

周山

周云之

周文英

郑伟宏

欧阳中石

崔清田

高振农

高银秀

董志铁

杨俊光

葛黔君

蔡伯铭

中國邏輯史

歐陽中石題



《中國邏輯史》編輯委員會

主 編

李匡武

副主編

周云之 周文英

編 委

（按姓氏筆畫為序）



本卷责任编辑

周文英 董志铁

本卷撰稿人

周文英 董志铁

周山 高银秀

高振农

引 言

自明朝末年至五四运动，这是中国逻辑思想发展的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明 末 清 初

明代自嘉靖以后，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开始孕育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因素，朱国桢《涌幢小品》等书记叙的“江南大贾及徽州商人无田而富”的许多事实，便意味着当时大江南北工商业发达，出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变化。龚定庵有几句很中肯的话。他说：“有明中叶嘉靖及万历之世，朝政不纲，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钱……风气渊雅……俗士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尔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习，有后世士大夫所不能攀跻者。不贤识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乎。”^① 龚氏的意思是说，明末在江南一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变化——一向为人们所轻视的商贾、优伶逐渐从儒家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树立新的道德观——说明那不是衰

^①见《定庵文集》文4《江左小辨序》。

世，而是包含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新时代的开端。

这些经济上和社会风气上的变化，反映到思想界里，便出现了一批思想家和学者，他们萌发着某种新思想、新意识、追求科学和民主。首先要提到的是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他们是明朝末年的士大夫，但兼具某些市民色彩，他们追求科学、朦胧地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以外的领域，即有某种世界眼光。比徐光启晚出的有顾炎武、王夫之、傅山、方以智等人，其中除傅山外，都生长并长期生活于江南一带，受着社会新风尚的影响和熏陶，并且亲眼看到高度极权的明王朝的灭亡，又直接受到新起的清王朝的胁迫和监视，滋长起了浓厚的民主思想。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物是“新时代开端”思想上的启蒙者，也是中国这一逻辑发展新时期的先驱人物。

这一阶段的逻辑发展有两个动向。

一是西方逻辑的输入。这次西方逻辑的传入应当看作是中国当时的有识之士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主动引进。1580年以后，利玛窦、傅汎济等一大批天主教士陆续来到中国。起先他们的传教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后来就以他们从西方带来的科学和逻辑相炫耀，结果受到了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的热烈欢迎。这就是西方逻辑输入的因缘和条件。很显然，中国内部的要求和愿望才是内因和根据。在西方逻辑首次输入过程中，最令人瞩目的事实当然是李之藻的翻译《名理探》，但我们还应当看到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意义。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是第一次把一种全新的演绎方法介绍给了中国的知识界。徐光启、李之藻都致力于输入西方科学、西方的数学知识，大力提倡、倡导科学思维、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对时代影响甚大，启迪甚多。

这一阶段逻辑发展的另一个动向是中国逻辑自身的发展。它

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恢复了对先秦古典逻辑的研究，这方面的先驱人物是傅山和程智。一是对逻辑方法的探究，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他们晚年都退居论学并将自己治学过程中的逻辑方法加以认真的总结。中国传统逻辑的发展，在明末清初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傅山对《老子》、《庄子》、《淮南子》、《亢仓子》、《鬼谷子》、《尹文子》、《邓析子》、《管子》、《鶡冠子》、《墨子》、《公孙龙子》都有批注，其中的《墨子大取篇释》、《公孙龙子注》兴微续绝，《荀子评注》、《庄子批》对荀子思想和庄子思想准确的逻辑定性分析，都显示了他在逻辑研究上的真知灼见和不可磨灭的功绩。无独有偶的是，还有程智的《守白论》亦是对公孙龙子之学的兴微续绝之作。《守白论》虽已佚失，但从现在残存的一些材料，亦可窥见其思想颇为细密深邃。王夫之的逻辑贡献主要是从唯物论的认识论或辩证思维的角度对中国传统逻辑的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进行概括分析。而方以智、顾炎武则是在考据的实践中去总结普通逻辑的方法。方以智、顾炎武的考据与逻辑最直接地影响着有清一代，而徐光启、李之藻、傅山等人的影响却没有延续很久。这种学术思想的兴盛或衰微，延续或中断，与由于明清王朝交替而引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的变化有关。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是明朝末年人。但除徐光启、李之藻之外，他们又都生活于清代初期，故把这一阶段称为明末清初。

戊戌变法前的清代时期

1644年满洲贵族率兵进入山海关，入主中原，1645年便开始

向江南推进。满洲贵族的掠夺，战争的破坏，使江南的工商业受到很大的摧残。不过这种经济上的逆转倒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清初的几位君主都是比较有作为的，所以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江南、广东等地的商业、手工业等又日渐繁荣，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不久便又超过了明朝末年的规模。然而这时的政治情况却和明朝末年衰微脆弱的封建统治不同，康、雍、乾、嘉是为清王朝的兴盛时期，统治得到强化。在这一段时期中，清王朝尽管也有某些局部的开明政策，但主导的方面是强化封建统治，重官轻商，重农抑工，经营工商业被认为是下民。在思想上、学术上则提倡理学，大兴文字狱，禁锢自由思想。最后理学虽然没有兴盛起来，但大批学者都转向了有点逃世避世的考据之学。不过强大的政治压力只能使矛盾暂时变得隐蔽起来。就在所谓乾嘉盛世之际，由新经济因素出现而引起的异端思想和新的思潮便已开始抬头，不过是在考据帷幕的掩盖下以曲折隐晦的形式逐渐透露出来。戴震、汪中便是汉学考据中异端倾向的代表人物。

道光以后，清王朝的腐朽衰弱开始表面化。吏治腐败，上百万军队（二十多万八旗和六、七十万绿营）几乎变得毫无战斗力。各种矛盾也日益尖锐和表面化，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四川等省普遍爆发了农民起义，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直接进入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清王朝的腐朽衰弱便完全被暴露，次后再经过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国内革命运动的打击，便变得越来越衰弱，越来越失去其控制的能力。这对中国新经济、新思想的发展造成了某些有利条件。外国资本的入侵，破坏着中国的自然经济，也扼制着处于微弱状态的中国资本主义因素，同时也给中国人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又添上

了一种新的枷锁。此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既没有象日本那样，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急速发展，但也并没有完全变成资本主义的附庸。随着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国内已经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在与外国资本和国内封建束缚的顽强搏斗中缓慢地迂回曲折地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1840年前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入了近代时期。近代中国的早期启蒙人物是龚自珍（1792—1841年）和魏源（1794—1857年）。他们直感到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弊病和积习，呼吁更法，倡言改革，在学术上倡导今文经学派，主张“通经致用”，把他们的改革思想和研究中国传统的学术结合起来。今文经学派和清代后期的汉学，虽然有点异曲，但实则同工，他们都是主张在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时要冲破束缚，讲究科学和民主。

这一阶段的逻辑发展，首先要提到的是颜元。颜元强调“求实”，强调“重验证”，这个问题是哲学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而且如果对“求实”和“验证方法”越说得具体便越偏于逻辑问题。颜元对求实验证方法的讨论还算不得很十分具体，但应当承认他是讨论到了逻辑的问题，颜元和他的学生李塨在当时开创了一个学派，影响较大。他所倡导的思想方法、逻辑方法上承方以智、傅山、顾炎武，下连清代的汉学家们。

有清一代的逻辑基本上是和汉学家联系着的。清代的汉学家在逻辑上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在汉学研究的实践中总结出逻辑方法，这些方法无疑都属于归纳、演绎的方法，但却具有特色，因而丰富了归纳、演绎的色彩和花样。汉学家们的另一建树是对中国古典逻辑文献的整理、考证和注疏。其中有些人只是把这些文献当作一般的古籍去整理，但是有些人却是看到了某些文献的逻辑意义（或说是属于古名家言）而特别致力于此项工作

的。他们的第三种贡献则是逻辑语义学方面的。汉学家们既讲演绎归纳的逻辑方法，又不可须臾离乎语言文字的研究。这种逻辑与语言研究（有些还包括哲学研究）的并重和交叉，使他们有些人开始涉足于逻辑语义学的研究。

就具体人物来说，戴震是一个较为关键的人物，他是清代汉学营垒中的中流砥柱。他在汉学研究中明确总结出某些逻辑方法，后来王念孙、王引之继续在这方面做出贡献。戴震还讨论了逻辑语义学方面的一些问题，在这方面继续工作的则有俞樾、刘师培；刘师培已是清末民初人，接触过西方逻辑，他的研究成果比俞樾的更有深度。在中国古典逻辑文献的整理方面，则有从汪中到孙诒让的一大批人从事工作。汪中的活动主要是鼓吹子学的复兴，他写的《荀卿子通论》、《墨子序》、《老子考异》和《吕氏春秋序》等有关文章，都贯穿一个中心，即孔、墨、荀、老等地位本来平等，“经书”、“子书”、高低之分都是后人的浅见卑识。汪中谕扬的《墨子》、《荀子》、《吕氏春秋》、《老子》都含有丰富的逻辑思想，这一点汪中也许不见得明确意识到了，但汪中的活动确实进一步揭开了中国古典逻辑复兴的序幕。与汪中约略同时的毕沅、王念孙、孙星衍、辛从益等则致力于《墨子》、《荀子》、《公孙龙子》等的具体整理工作，一时蔚然成风。到了稍后的张惠言、陈澧等又开始对诸子中的逻辑著作进行整理和进行专门的逻辑研究。

此外还有章学诚的史学中的逻辑方法，焦循数理易学中的逻辑方法。章学诚和焦循一般不算是汉学家，但却与汉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他们也尚没有完全跳出汉学的藩篱。

清代汉学家对中国传统逻辑的直接贡献也许并不是十分的多，但却给尔后的发展以很大的后劲力量。诸子并重无偏无颇的

民主学风，对有关典籍的卓有成效的整理，给中国传统逻辑研究的大发展创造了思想条件和资料的前提。精湛的文字功夫，在考据实践中对归纳、演绎的运用、体验与创造（虽然他们有些人也许并不知道流行与西方的这两个述语）而形成的逻辑头脑，这一切又使许多汉学家对逻辑具有某种敏感性，汪中、陈澧、张惠言、孙诒让等都具有这种良好的素质。孙诒让的情况是比较典型的，他治《墨子》三十余年，在注疏该书时不侈言逻辑，看似木讷，实为谨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他完成《墨子闲诂》的著述并致书梁启超：“尝谓《墨经》……必有微言大义如欧士亚里大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①鼓励梁启超去开创三种逻辑比较研究之盛业。孙诒让也许更多的的是一个考据家，但却具有敏锐的逻辑眼光。他给梁启超写信时，《墨子闲诂》已最后定本，在学术上主要的纪录已经完成，然而却在逻辑研究方面余热奔放，高瞻远瞩。这时他年过五十，自己虽然不能再创新的里程碑，但却积极启迪后学，这也是后劲力的一种表现。孙诒让以后的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都深受汉学的熏陶，熟悉古典文献，精于古文字功夫，这种情况保证了在尔后一段时期的逻辑思想发展过程中，中国自身逻辑思想的发展始终保持着主体的性质，西方的逻辑，印度的因明更多的是作为研究中国传统逻辑的借鉴。

清 末 民 初

1895年清政府被日本战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代表民族

^①见方授楚《墨学源流》中华书局1940年版第219页。

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政治要求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发动各省应试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上书光绪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要求变法图强。随后即组织强学会，接着又在各地组织学会，设立学堂和报馆，宣传变法维新，影响及于全国。1898年，光绪帝明确接受变法主张，于当年4月至9月陆续颁发维新法令，推行新政。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坚决反对变法维新，1898年（戊戌年）9月21日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害，康、梁逃亡日本。戊戌政变使许多人认识到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自此以后，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高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各种矛盾交织的情况下，脆弱的满清王朝立即垮台。辛亥革命虽然并不彻底，但它毕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一次重大胜利。从此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此后虽尚有袁世凯的称帝和张勋复辟，但都迅速失败。旧民主主义革命继续以不可逆转的趋势缓慢地前进着。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开始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

自从戊戌变法以后，随着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不断发展，在思想领域和学术领域中也越来越呈现出生气蓬勃和自由奔放的新气象。

这一阶段的逻辑研究，有着多方面的明显可见的成就。其一是完成了对西方逻辑的系统输入工作。其二是在中国曾一度得到兴盛和发展的印度逻辑经过一段长期沉寂之后在这时开始复苏并逐渐弘扬。其三是中国古典逻辑研究的长足进步，它不仅不再附庸于考据和古籍整理而成了专门的学问，而且几乎一开始就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即借鉴西方和印度的逻辑来探究中国古典逻辑的精义。应当指出，同时借鉴两种外国逻辑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是有较多区别的，这样就能打破“西方逻

辑一体化模式”的观念，使中国从事逻辑比较研究的那些先驱人物，一开始就思想比较活跃，没有出现严重的思想僵化和死板的毛病。

在逻辑发展的这一阶段，开创局面和贡献卓著的人物多为当时政治思想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如严复、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严复是输入西方逻辑的主将和带头人。严复所译《穆勒名学》的原作者虽然被目为归纳派，但《穆勒名学》本身还是详细地介绍了演绎推理。另外严复还翻译了《名学浅说》一书，这是一本逻辑入门的书，它无偏无颇地同时介绍了演绎和归纳。所以严复实已把西方传统逻辑的内容系统地输入了中国。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说，严译《穆勒名学》是西方逻辑输入中国的重要里程碑，影响巨大。但严译《穆勒名学》文字艰深、逻辑述语亦多乖僻不合时宜，故普及性很差。对此，鲁迅和王国维都有所誉议。然而严复还有个带头作用，他影响和推动了许多人去积极从事西方逻辑的输入工作。严复以后，在西方逻辑输入方面的代表人物有王国维、胡茂如、林可培等。王国维翻译了英人耶芳斯的《辨学》，胡茂如译有日人大西祝的《论理学》，而林可培则综合多种日本逻辑而编译有《论理学通义》。这些译著不仅内容系统充实，而且有较好的通俗性和普及性，从而把西方逻辑系统输入工作推进到了深入阶段。章太炎是倡导因明的一个关键人物。不过使因明得到复苏的第一个人物并不是章太炎而是杨文会。杨文会的后半生，全心致力于弘扬佛学并认定因明乃是弘扬佛学的重要工具，因而积极搜求、刊布因明典籍，在培养佛学人才时也要求他们重视因明的学习，因而导致了因明的复苏。此后，因明之学，经由章太炎这样一个各方面极有影响人物的推崇和倡导，再加上欧阳竟无、释太虚和慧园居士等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工作，遂得逐

渐弘扬。章太炎还是从事逻辑比较研究的重要人物。不过开逻辑比较研究先河的还是梁启超。1904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写有“与希腊学派比较，先秦学派之所短”一节，其中说到“中国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文中仅说到邓析、惠施、公孙龙，未讲墨家。同年，又撰写《墨子之论理学》一文，将西方逻辑与墨家逻辑作了比较对照。梁启超这时还只限于将中国逻辑和西方逻辑加以比较。1909年，章太炎写有《原名》一文，不仅将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加以比较，而且还与印度因明作比较。章太炎还把因明论式誉为最完美的逻辑形式。他也许矫枉过正，但这对打破西方逻辑一体化模式的僵化观点是很有作用的。嗣后中国的许多学者都非常注意中、印逻辑之比较研究。1920年梁启超出版《墨子学集》一书，便不是只将中西逻辑进行比较，而是将三种逻辑进行比较研究了。梁启超还认为《墨经》之论式固有和西方三段论相似者，而更多的则是和因明论式相似。

这一阶段更为晚出的逻辑著作则是胡适的《先秦名学史》。这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的一篇博士论文，1917年论文答辩时便已公诸于世，1922年正式刊行出版。顾名思义，这是一本逻辑断代史的著作。《先秦名学史》也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胡适是把西方逻辑特别是杜威的实用主义逻辑作为借鉴和准绳的，没有提到印度因明。不过胡适认为墨家逻辑和杜威方法都是一种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综合逻辑形式。1921年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又说到汉学家的治学方法和印度因明也是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①实际上也是将三种逻辑进行了比较研究。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逻辑研究进入了更加多产和丰收的季节，具体情况将在第五卷中加以叙述。

^①见《胡适哲学资料选》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第194页。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西方逻辑的传入

- 第一节 利玛窦与西学东渐 (1)
- 第二节 徐光启和《几何原本》 (8)
- 第三节 李之藻与《名理探》 (15)

第二章 明清之际关于先秦逻辑的研究

- 第一节 程智与《守白论》 (29)
- 第二节 傅山的子学研究 (42)

第三章 明清之际科学研究中的逻辑方法

- 第一节 方以智的考证研究方法 (58)
- 第二节 顾炎武的考证研究方法 (65)
- 第三节 王夫之对名、辞、说等的辩证分析 (71)

第四章 清代的中国传统逻辑

- 第一节 颜元求实重验的逻辑方法 (81)
- 第二节 戴震的逻辑思想 (85)
- 第三节 专门汉学研究中的逻辑方法 (92)
- 第四节 章学诚、焦循的逻辑方法 (109)
- 第五节 中国古代逻辑典籍整理工作 (118)

第五章 西方逻辑的系统输入

- 第一节 西方逻辑系统输入的初始阶段 (126)
- 第二节 西方逻辑系统输入的发展阶段 (136)
- 第三节 西方逻辑系统输入的深入阶段 (162)
- 第四节 西方逻辑系统输入的成熟阶段 (172)

第六章 因明的复苏和弘扬

- 第一节 背景和前奏 (181)
- 第二节 因明在清末的复苏 (186)
- 第三节 因明的弘扬 (190)

第七章 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的逻辑研究工作

- 第一节 梁启超的早期比较逻辑 (208)
- 第二节 章太炎的逻辑思想 (215)
- 第三节 胡适的《先秦名学史》 (233)

后 记 (260)